

中国不能患上“涨薪恐惧症”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和《工资条例》历时多年不能出台，主要是担忧工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会侵害中国竞争力优势并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胀。

只要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同步增长或略高于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就不会生成通胀或挤压利润空间。国家需要降税负让利于民。最根本的还是要由低成本驱动增长向劳动生产率驱动增长转变。中国经济要从失衡走向良性平衡，本质上就是要弥合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工资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

张荣楠

涨薪为何这么难？中国似乎有成本上涨的恐惧症。工资增长与中国经济增长不同步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未来如何稳步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摆脱低水平均衡的陷阱，将是中国经济良性增长的关键一步。

为何患上了“涨薪恐惧症”？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和《工资条例》历时多年，几易其稿，迟迟不能出台，不仅在于工资利益分配、同工同酬等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更在于对工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是否会侵害中国的竞争力优势以及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担忧。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短期通胀总水平的确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推升物价的具体影响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直接推升服务类消费价格上涨。相比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构成中食品和工业品两大类商品，劳动力成本（尤其是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服务类消费项目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由于工资的黏性以及向产品价格传导的滞

后性等因素，人力成本上升对最终商品销售价格的传导效果可能存在较大程度的削弱，而家政等服务类转移人力成本和提价则相对容易。

第二是间接推动制造业产成品价格上涨。资本密集型及附加值较高的企业，一般具有足够的利润消化成本。但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工资占企业生产成本比重较高，工资上涨必然导致企业成本的相对上升。

但是，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的触发机制是有条件的，即货币工资的上涨幅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速。一般而言，当实际工资与实际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幅度会被劳动力的更高产出完全消化，因而劳动力成本和利润占总产出比例保持不变。名义工资的增长率应相当于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加上通胀率，只要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同步增长或略高于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就不会生成通胀或挤压利润空间。

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

上获得优势，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的价值洼地。这不仅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也阻碍了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提高的步伐，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形成全社会低工资的状况，但反过来看，生产要素价格的长期低估也是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经济内外失衡和产业结构低端化的症结所在，中国廉价成本造就的低成本优势不可能再持续下去。

化解“涨薪恐惧症”的途径

从短期看，国家需要降税负让利于民。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税负较高，这直接导致非常高的经营成本。2005年，美国《福布斯》发表的年度“税负痛苦指数”中，中国的宏观税负负担指数以160位居全球第二。我们无法考证这些数字的全面性、合理性和真实性，但是，我国中小企业承担着高税负是个不争的事实，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中小企业从总体税负负担水平上看，居高不下，税收占销售收入的负担率为6.81%，高于全国各类企业6.65%的平均水平；税收占资产总额的负担率为4.9%，高于全国1.91%的平均水平。过重的税负不但增大了企业的负担，也挤占了工资上涨的空间，如果税收负担能下降，这部分成本下压之后完全能用来填补工人工资上涨的成本。

而从另一方面看，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也远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财政收入增长状况看，1996年开始，财政收入增长率一直高于劳动者报酬增长率，在2001年、2004年两者的差额分别高达15.4%和12.8%，2007年财政收入的增

长率更是高达32.4%，2008年和2009年也分别达到19.5%和11.7%，这种情况下，还富于民还有很大空间。

最根本的还是要由低成本驱动增长向劳动生产率驱动增长转变。事实上，要判断一个国家的成本压力和竞争力，重要的是比较工资的增长与生产率的增长，如何把工资上涨当作一种倒逼机制也可能是经济转型的关键一步。国际经验表明，工资上涨并不能降低一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反而可能成为结构优化的契机。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都曾经历过人力成本上升的过程。例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以高投资、高化工为主导，带动了经济的起飞。但在1970年前后，工资快速上升推动日本在70年代初期进行结构转型。根据日本的经验，工资水平上涨后，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普遍提高，并且还出现了制造业内部的结构转型，低端制造业面临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例如，1970年至2000年的30年内，日本纺织业增加值所占制造业增加值比例由5.5%下降到1.3%；而随着新技术的应用，高端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期电气机械业增加值所占制造业增加值由11%上升到16%，金属制品、通用设备、电子设备等占比持续提升。

因此，中国经济要从失衡走向良性平衡，本质上就是要弥合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工资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中国未来几年将面临劳动力重估的进程，中国能否以此形成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从而带动中国经济二次起飞，这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焦点评论



新个税法今日实施

个税今起减负担，免征人数六千万。政府让利是好事，公众受益有感叹。促进消费少空论，扩大内需多实干。贫富分化仍严重，初次分配要攻关。

赵天奇/漫画 孙勇/诗

康菲溢油事故应引入第三方监督

吴睿鹤

在渤海漏油事件中，肇事者美国康菲公司的从容与淡定，已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初期，不管职能部门再三令中，还是媒体舆论的给力监督，康菲公司似乎一直主导着这起重大公共事故的发展，从一开始声称污染面积从原来的200平方米左右猛增到现在的840平方公里，油基泥浆溢油量也从预计的1500桶，增加到2500多桶，直到今天仍有漏油点，还在继续渗透着。公众一次次被无情戏弄。在整个过程中，康菲公司一直谎话连篇，推诿责任，处置怠慢，态度恶劣。在8月20日的声明中，康菲一方面表示没有油膜到达海岸，另一方面又表示有少量颗粒到达岸边，这本身就自相矛盾。康菲向社会的公开表态，无非是在为自己做辩护，急于撇清自己的责任。不仅看了让人瞠目结舌，更让国民领教到外企的傲慢与无理。

好在我国开始动用大量行政资源，组成“史上最牛”联合调查组，将对康菲公司开始施压。纵观整个新闻报道，七部委实施联合调查的五个关键词——

必须、不折不扣、彻底、保证和无条件，特别吸引人们的眼球。既让普通老百姓看到了给力的举措，又能让公众看到国家层面整治跨国企业污染的决心与信心。

可是，鉴于康菲公司的劣根性和不可救药性，即便现在靠七部委的强力调查，康菲公司恐怕也不会主动服软，更不会俯首听命，反而极有可能继续自说自话，逃避监管和法律的惩处。因此，我觉得，现在有必要引入第三方监督，由行业内权威专家，组成第三监督专家委员会，直接介入到康菲公司，进行全方位的监督，这不仅能保障事故处理的公平与正义，也有利于规避康菲公司自己说了算。

目前跨国公司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极，我们在分享它们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同时，这些跨国公司也在分享着我国的改革成果，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但是，类似康菲渤海漏油事件的出现，无疑给我国敲响了警钟，我以为，应以康菲渤海漏油事件为契机，倒逼我国完善环境监管、海洋立法以及外国合作的法律法规，以严密的监督和严厉的法律，对那些目空一切的跨国企业警示与教训，以维护国民的利益和法律应有的尊严。

“税收法定”原则应该及早推行

晏庆盛

9月1日是修订后个人所得税法正式实施的日子，3500元个税起征点（免征额）使得缴纳个税的人数由8400万减至2400万，从中受益的主要是中低收入者，政府财政收入则因此一年减少1600亿元左右。不过，相对于今年有望超过10万亿元的财政收入总额，1600亿元只能算是小菜一碟，正如许多专家所言，个税法修订只是税制改革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深化税制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减轻税负以藏富于民，让税收更加合情合理，自然是民众对于税制改革的最大诉求。要让税收更加合情合理，首先要让税收更加合法，在这方面有一个好消息传来：财政部日前公布的一个意见提出，将结合税制改革，进一步推进税收立法，按照成熟一个出台一个的原则，逐步将税收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

原则，这里的“法”专指法律，在我国，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法律。税收是政府伸手向老百姓收钱，这是国家大事，涉及民众切身利益，所以税收应当“法定”，征哪些税、怎样征、征多少等问题，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充分征求民意的基础上出台相关法律。只不过，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中国税制的一大特色是，很多税收的依据不是法律，而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税收条例或暂行条例。目前我国税收体系中有几十个税种，但除了所得税、车船税等极少数税种制定了法律，绝大多数税种都以条例或暂行条例的方式确定。比如最近舆论热议的房产“加名税”，所依据的就是《契税法暂行条例》。

以条例或暂行条例的方式确定征哪些税、征多少税，固然有多种历史和现实原因，但其弊端显而易见。其一，政府难免有扩大自身收入、向民众多征税的冲动，这种冲动必须受到人大的遏制，即由人大决定政府可以征哪种税、

征多少税。否则，由政府自行确定税种和税额，难免就多不就少、就高不就低，导致民众税负繁重，而太有钱的政府往往不懂得厉行节约。“税收法定”的重要性及其对于减轻民众税负的意义，在去年车船税立法、今年个税修法过程中都有充分体现，让民众感受深刻，倘若没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关，两部税法可能不会达成圆满的结果。

其二，很多税收条例和暂行条例是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制定的，当时“开门立法”的意识缺失，征求社会意见的程序缺失，导致一些条例和暂行条例的民意含量严重不足，甚至被塞进部门利益的“私货”，其合理性越来越受到质疑。

其三，有的税收暂行条例“暂行”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实际。比如《契税法暂行条例》是1997年制定的，当时住房市场化改革尚未全面推行，个人住房权属转移（如名、赠与）远没有现在这样复杂，现在的“加

名税”之争，可谓是老条例遇到了新问题。

其四，一些税收条例和暂行条例与法律（上位法）规定不相符，条例与条例之间也存在冲突。仍以“加名税”为例，按照《继承法》，继承配偶的房产不需要另缴契税，为什么夫妻之间房产加名、赠与要另征契税呢？这两种情况并无本质的区别。

制定一个条例或暂行条例就可以向老百姓征税，这种方式不应再继续下去了，将税收条例和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经过“人大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和“民意关”（征求社会意见）的锤炼，这样的税收才会更加公平公正、合情合理，更能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将税收条例和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可以说是弥补历史欠账，弥补这个历史欠账的关键是决心和诚意，只要有了决心和诚意，很多税收立法的条件就会早日成熟；若缺少决心和诚意，则很多税收立法的条件总也成熟不了。希望在税收条例和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的过程中，“税收法定”原则能够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

经济时评 | Hot Topic |

欧元稳定 有利于促进人民币汇改

欧元区主权债务问题集中体现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但是，与欧元对应的，应该是欧元区所有成员国的总体债务状况。欧元区实体经济与其金融市场尤其是欧元区国债市场之间的相互协调是影响未来欧元稳定的决定因素。中国对欧洲经济和欧元抱有信心。欧元稳定有利于提高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有助于改善人民币汇改的外部条件。中国应及早关闭中央政府的外汇储备闸门，并将以后新增的外汇有续地引入国内外汇市场，以促进中国外汇市场建设。

于建国

欧元区主权债务总体可控

目前，欧元区主权债务总体水平并不过高，而且处于可控状态。2010年，欧元区全体成员国主权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85.3%，美国为77.4%。日本则为180.4%（2009年）。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分别为6.0%、10.6%和8.7%。欧元区主权债务水平与美国相当，均未超过90%公认警戒线，而其财政赤字规模却显著地低于美国。

除此之外，欧元区主权债务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欧元为主发行债券，欧债违约风险很小。欧元区99.06%的主权债务是以欧元或以欧元发行参与货币发行的。因此，即使希腊和意大利主权债务占GDP比重远高于欧元区总体水平，分别达到142.8%和119.0%（2010），而爱尔兰财政赤字占GDP比重更是高居各成员国之首，达到了32.4%（2010），但是，欧元区主权债务违约仍鲜有听闻。

第二，欧债当中外债比例小，外债风险较小。欧元区政府债务当中，外债占欧元区GDP28.9%。

第三，欧债融资结构合理，欧债收益率较高。欧元区主权债务47.9%为欧元区国内投资者持有。这与美国和日本的主权债务投资者结构形成了鲜明对照。日本主权债务以国内投资者持有为主，占主权债务的95%，但是，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由于日本国内储备率下降，这种投资者结构约束了主权债务的国内可融资规模。美国主权债务以国外投资者持有为主，占主权债务的70%左右。国外投资者为主的投资者结构也使得美国政府对国债市场风险的控能力较差。反之，对欧元区区和区外两种融资资源的依赖提高了欧元区主权债务的安全性和流通性。欧债较高的收益率则提高了欧债的吸引力。2011年7月份，欧元区、美国和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4.59%、2.98%和1.12%。同月，欧元区AAA级国债收益率也达到了3.06%。欧元区主权债务的安全性、流通性和高收益性符合外汇储备的三性要求。

均衡汇率 影响欧元名义汇率走向

欧债高收益主要得益于欧元区较高的利率和坚挺的汇率。然而，高利率和欧元升值并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欧元区实体经济与其金融市场尤其是国债市场之间的这种不协调，在汇率形成上，表现为其实体经济对应的均衡汇率与国债市场对应的均衡汇率的较大背离。

我们以固定资本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变动关系分析实体经济均衡汇率。一国固定资本增长率/GDP增长率上升，则该固本收益下降，对外资吸引力下降，外资流入量减少，外汇市场上本币需求减少，汇率下降。在此过程中，汇率一方面随着固定资本增长率/GDP增长率上升而下降，另一方面汇率下降在抑制资本流入的同时，也对缓解该国固定资本增长率/GDP增长率的上升速度起到了主动的、积极的调节作用。从这个观点出发，结合欧元区相关的经济数据，用非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得出的欧元兑美元的均衡汇率为1.20。

与此同时，我们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结合欧元区国债市场外债净流入和10年期AAA级国债收益率，得出欧元兑美元的均衡汇率为1.48。欧元区国债市场均衡汇率之所以高于实体经济均衡汇率，其原因主要是：其一，欧洲央行今年4月7日和7月7日两次加息。加息提高了欧元的利率平价水平；其二，欧元仍处于货币国际化的成长期。根据欧债占GDP比重与欧元区季度统计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得出两者保持着正相关关系。欧元区国债市场均衡汇率与实体经济均衡汇率的背离影响着欧元名义汇率的未来走向。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衡汇率与国债市场对应的均衡汇率的较大背离。

我们以固定资本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变动关系分析实体经济均衡汇率。一国固定资本增长率/GDP增长率上升，则该固本收益下降，对外资吸引力下降，外资流入量减少，外汇市场上本币需求减少，汇率下降。在此过程中，汇率一方面随着固定资本增长率/GDP增长率上升而下降，另一方面汇率下降在抑制资本流入的同时，也对缓解该国固定资本增长率/GDP增长率的上升速度起到了主动的、积极的调节作用。从这个观点出发，结合欧元区相关的经济数据，用非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得出的欧元兑美元的均衡汇率为1.20。

与此同时，我们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结合欧元区国债市场外债净流入和10年期AAA级国债收益率，得出欧元兑美元的均衡汇率为1.48。欧元区国债市场均衡汇率之所以高于实体经济均衡汇率，其原因主要是：其一，欧洲央行今年4月7日和7月7日两次加息。加息提高了欧元的利率平价水平；其二，欧元仍处于货币国际化的成长期。根据欧债占GDP比重与欧元区季度统计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得出两者保持着正相关关系。欧元区国债市场均衡汇率与实体经济均衡汇率的背离影响着欧元名义汇率的未来走向。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中国应改革 外汇储备管理体制

今年下半年欧元依然以汇价弹性而不是升值为主。欧元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保持着较大的弹性，这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的稳定性，也有助于中国加快汇改的速度。

年初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单边升值3.8%，人民币投资收益率与人民币升值幅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期，欧元兑美元经历了一波主升浪和三波较大的回调，欧元投资收益率达到28.0%。因此，与欧元相比，人民币不具有短期投资价值。只是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才使得人民币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由此，可以引出两点结论，一是与央行结汇的应该是企业和居民的长期外汇收益。经过结汇，长期外汇收益形成的人民币存款才有可能作为准备金被长期锁定在央行。从而使得央行的外汇结汇政策与央行的准备金政策相匹配。二是短期外汇的投资高收益对应的是国内短期外汇的稀缺性。商业银行外汇存贷款倒挂和短期外债的节节攀升将成为一种长期现象。

我国政府应该及早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可行的方法是及早关闭中央政府的外汇储备闸门，并将以后新增的外汇有续地引入国内外汇市场，以促进中国外汇市场建设。发达的国内外汇市场将有利于资本项目开放，有利于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人民币价值发现功能，也将有利于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子邮箱至pp118@126.com。